

公平和效率

两者间存在取舍还是可以携手并进？

安德鲁·伯格、乔纳森·D. 奥斯特里

在其 1975 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公平和效率：大取舍》一书中，阿瑟·奥肯主张，追求公平可降低效率（效率是指对资源进行最优利用以实现产出的最大化）。这位已故的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不仅会降低工作和投资的动力，而且收入重新分配（通过诸如税法和最低工资之类的机制）自身的成本会十分高昂。奥肯把这些机制比作“漏水的桶”。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的一些资源“将会在转移中消失，因此穷人不会得到从富人那里转移出来的全部金钱”——原因有二：其一是行政成本使然；其二是纳税人和资源转移接受方的工作积极性均受到了抑制。





在高效生产与公平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之间，社会群体难道一定要面临两难选择吗？社会公正和社会产出彼此之间真的水火不容吗？

简言之，并非如此。

在最近所做的研究（Berg、Ostry 和 Zettelmeyer, 2011 年；以及 Berg 和 Ostry, 2011 年）中，我们发现，当从长期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时，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取舍可能不存在。事实上，在促进和维持增长方面，公平似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些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可维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而其他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则会迅速消亡，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所在可能是收入的不公平程度。各国或许会发现，提高收入公平性也可以同时带来效率的提升，而这被视为更具持续性的长期增长。

就世界各地的情况而言，收入的不公平性对经济增长和其他宏观经济结果可产生重要影响。最近，中东出现了极大的动荡，人们认为，其中的大部分原因是收入不公引发的不满，只要对此稍加关注，即可深刻领会收入不公的重要影响。此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最近数十年内的收入差距扩大与 20 世纪 20 年代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两种情形中，金融部门都曾出现繁荣局面，穷人大量借贷，然后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见《金融与发展》2010 年 12 月号“改善不平等”，以及本期《金融与发展》“分配不均必然导致负债”）。最近所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金融市场，但是至少有部分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公。随着美国及其他重要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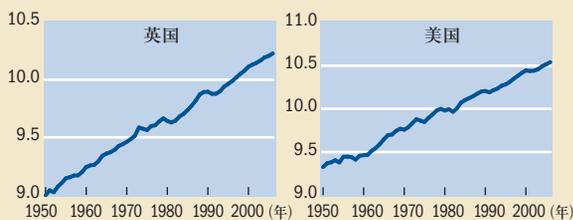
经济体以何种方式增长？

大多数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观点都暗含了一种假定，即发展与爬山类似，实际收入必须实现或多或少的稳定增长，期间也会受到商业周期波动的影响。图 1 中的模式便反映了这一观点，该图显示了英国和

图 1
爬山

对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而言，长期来看，其收入以相对稳定的步伐增长。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值）



资料来源：佩恩表（6.2版）。

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对数值测量，这意味着该线越直，增长率越恒定。

美国这两个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扣除通胀因素）人均收入水平。

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历要更加多样化（见图 2）。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经历类似爬山。但在有些时候，这方面的经历更像坐过山车。通过考察这些案例，普里切特（2000 年）和其他作者认为，若要理解增长，必须更密切地观察拐点——忽略商业周期背景下经济增长的起伏，同时集中关注为何一些国家能保持长时间增长，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几年之后便出现停顿，此后便陷入停滞或衰落。

对具有上述经历的国家进行的系统性考察表明，启动增长比维持增长的难度小得多（Hausmann、Pritchett 和 Rodrik, 2005 年）。即使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成功地维持几年的经济增长，但结果却是增长逐渐消失。与其他更为成功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落后的国家的差距在于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能力。

收入分配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考察了增长期持续时间与国家特征和政策方面差异相关的程度。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质量、经济的外向性、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对增长期的持续时间也很重要。

我们认为，收入分布也可能——并且是独立地——是影响经济增长持续时间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从简单相关性的层面看，更大的收入差距似乎与经济增长持续时间较短相关。图 3 显示了样本国家经济增长期

图 2

过山车

在发展和新兴市场中，长期增长路径可能稳定，也可能不那么稳定。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值）



资料来源：佩恩表（6.2版）。

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对数值测量，这意味着该线越直，增长率越恒定。垂直虚线代表增长率出现显著和持续的增加或下降的时间段。

的持续时间和此期间平均收入的分布。我们将增长期定义为至少为五年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的开始阶段，增长率出现大幅提高，而后以增长率的大幅下降而结束。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是基尼系数，该系数的范围是0（所有家庭收入相同）到100（全部收入由一个家庭获得）。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持续时间较短密切相关，这似乎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毕竟，对于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及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而言，某种程度的收入差距必不可少（Chaudhuri 和 Ravallion, 2007 年）。但差距太大可能破坏增长。收入差距或许具有加剧金融危机可能性的风险，此外，它还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性，而这种动荡不利于投资。在面临冲击时，收入差距可能使政府更难以作出艰难但必要的选择，例如增加税负或削减公共支出以避免陷入债务危机。抑或收入差距反映的是穷人难以获取金融服务的事实，而这减少了他们投资于教育和创业活动的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产生的疑问是，对数据的系统性考察是否支持这一观点：收入分布越平等的社会，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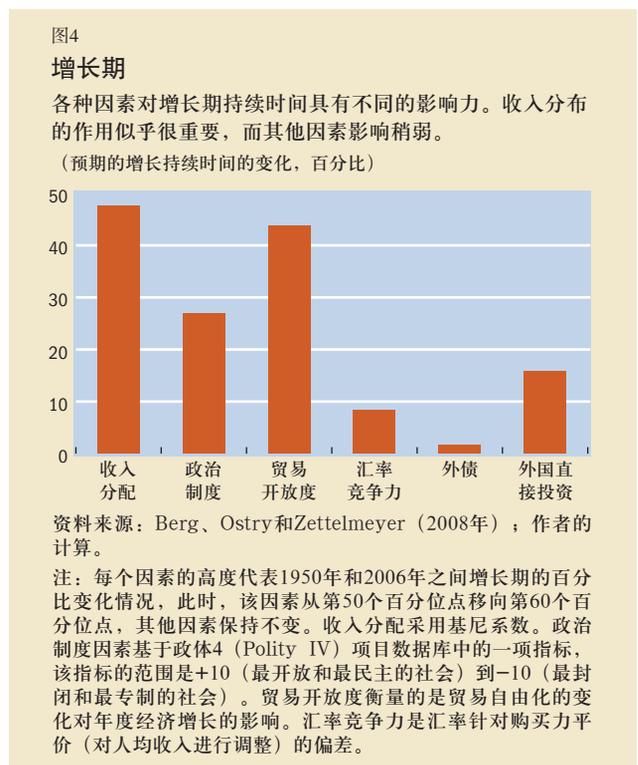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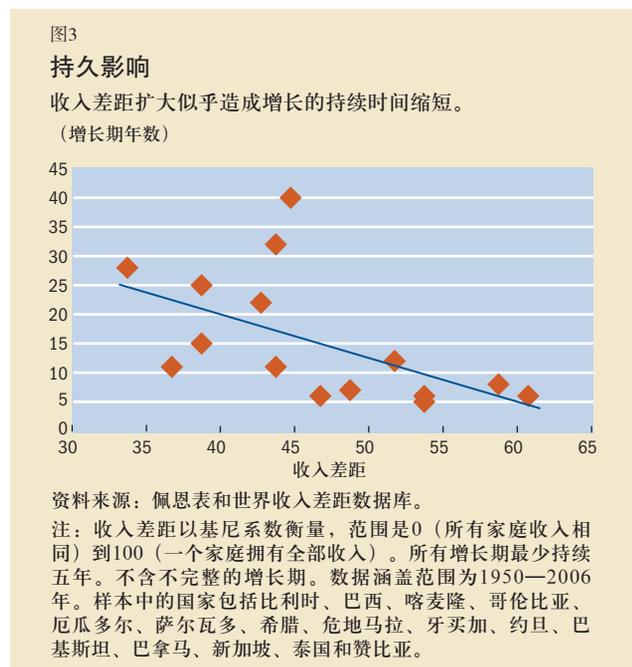
我们像医学研究人员考察预期寿命那样研究经济增长期。他们研究年龄、体重、性别和吸烟习惯对预期寿命的影响；我们考察诸如政治制度、医疗和教育、宏观经济稳定性、债务和贸易开放性等因素是否具有导致增长期结束的可能性。其结果是一个有关增长期持续时间的统计模型，该模型将增长期的预计持续时间（或者增长期在给定年份结束的风险）与这些变量中的一些相关联。我们将增长期在给定年度结束的风险与这些变量在以往年份的数值相比较——在增长期的开始阶段或此前一年——目的是将反向因果关系的

风险最小化。鉴于因果分析中常见的困难，以及我们无法对重要变量进行精准测量的风险，我们在下述报告中所得出的结果应该被视为经验性的规律（“典型化事实”）。

分析表明，在其他情况下显得颇为重要的许多变量，也往往与更长的增长期有关（见图4）。为突出每个变量的重要性，该图（涵盖了1950—2006年的数据）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对相关的变量给定一个增量时，增长期预期持续时间会相应增加。为比较不同变量对增长期的影响，我们计算了当所有变量取中位数（比样本中观察值50%处的数值大的数）时的预期增长时间。然后我们增大每个变量，每次一个变量，并观察预期增长持续时间的变化。我们希望其中每个增量的大小可随时进行比较。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增加每个变量的幅度是：从中位数增加至比样本中60%处数值更大的一个数值（增加10个百分点）。

持续增长面临的危险

令人有些惊讶的是，在与增长期持续时间的关系强度和稳定性方面，收入差距所发挥的作用令人印象深刻：收入差距下降10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从40个百分点下降到37个百分点）使增长期的预计持续时间提高50%。这一效果很显著，而这一明显提高是许多国家在增长期内所经历过的。我们估计，如果将拉美和新兴亚洲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差距缩小（比如说一半），那么将使拉美的增长期的预计持续时间增加一倍



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同时兼顾了许多潜在的决定因素（对于诸如制度和贸易开放性水平等良好增长表现的传统决定因素而言，我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收入差距依然表现出其统计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当我们容许预期增长持续时间存在地区差别（例如亚洲和非洲新兴经济体之间）时，收入差距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收入差距本身似乎很重要，而且并非仅仅是其他因素的替代性指标。与其他变量相比较，在不同的样本和对增长期的不同定义下，收入差距比其他变量更系统地保留了其显著性。当然，差距并非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它如同政治制度质量或贸易开放性一样，显然属于确认无疑的增长因素。

在国家实际经济增长期内的政治和经济表现中，这些统计结果是否具有一定的地位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例如在喀麦隆，1978—1985年的平均增长率是7%。之后，经济便开始下滑，增长率在随后十年中每年下降6%。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财富最初为公共部门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在公共部门雇员工资方面尤为如此，事实证明，在油价下跌时，公共部门员工工资很难削减。“对于避免国家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而言，虽然这些措施（削减政府开支）显得十分必要，但它们非常不受欢迎，因为它们对政治精英和政府上层人士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这些人的特权仍然毫发无损”（Mbaku和Takougang，2003年）。我们对增长持续时间的统计模型表明，增长期在1985年结束的风险将会很高——比处于增长期的国家通常面临的风险高100倍以上。该模型将这种高风险主要归因于喀麦隆非常显著的收入差距、较低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和较强的专制程度。

喀麦隆具有典型性。我们考察了六个历史案例，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尼日利亚。这些案例以及我们对许多增长期的广泛统计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是一项基本特征，它可能促使许多因素——例如外部冲击、外债、种族分化——共同作用，致使增长期戛然而止。

推动潮流

一项相当确定的结论是，如果将增长和收入分布割裂开进行独立分析，这便大错特错了。这与航海具有相似性：水涨船高，我们的分析表明，帮助抬升最小的船只可能有助于使潮水推高大大小小的所有船只。

但是，政策的直接作用没有那么明确。收入差距扩大可能缩短增长的持续时间，但考虑欠周全的缩小差距的措施可能反而达不到预期目标。如果这些努力扭曲了激励措施的作用并破坏增长，则它们对穷人的影响弊大于利。例如，最初的改革激起了中国的经济

增长，改革便涉及到给予农民更大的激励。这种激励措施提高了穷人收入并降低了总体收入差距，因为它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它很可能造成了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旨在对这种收入差距产生限制作用的措施可能阻碍生产（Chaudhuri和Ravallion，2007年）。

但是，仍然可能施行一些共赢的政策，例如目标更明确的补贴、让穷人更多地接受教育以提高其获取经济机会的平等程度，以及实施积极的劳务市场措施以提升就业率。

当政策对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之间存在短期取舍关系时，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清晰表明可采取何种措施。但我们的分析应该倾向于缩小差距的长期利益——其中包括对经济增长的考量。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差距缩小和持续增长可能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这一分析使人们回想起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由经济增长缓慢和痛苦调整所导致的“失去的十年”。这一经历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当改革的利益可被大众所分享时，才具备可持续性经济改革的可能性。鉴于当前所面临的全球经济混乱以及许多国家所面临的艰难的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性，更为可取的做法是，牢记这些教训而不让悲剧重演。■

安德鲁·伯格（Andrew Berg）是IMF研究部助理主任，乔纳森·D.奥斯特里（Jonathan D. Ostry）是该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 Barro, Robert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5, No. 1, pp. 5-32.
- Berg, Andrew, and Jonathan D. Ostry, 2011, "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1/0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 and Jeromin Zettelmeyer, 2011, "What Makes Growth Sustained?"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Chaudhuri, Shubham, and Martin Ravallion, 2007, "Partially Awakened Giants: Uneven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in *Dancing with Giants: China, Ind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ed. by L. Alan Winters and Shahid Yusuf (Washington: World Bank).
- Hausmann, Ricardo, Lant Pritchett, and Dani Rodrik, 2005, "Growth Acceler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0, No. 4, pp. 303-29.
- Mbaku, John M., and Joseph Takougang, eds., 2003, *The Leadership Challenge in Africa: Cameroon under Paul Biya* (Trenton, New Jersey: Africa World Press).
- Okun, Arthur, 1975,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Polity IV Project, 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 Pritchett, Lant, 2000, "Understand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Searching for Hills among Plateaus, Mountains, and Plain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4, No. 2, pp. 221-50.
- Wacziarg, Romain, and Karen Horn Welch, 2008,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New Evidenc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22, No. 2, pp. 187-231.